

抗戰的年代

一夫當關在墨國

●余受之（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）

我是外江佬呂宋客

一九九五年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對我個人來說，是一生中難以忘懷的日子。抗戰期間，我在墨西哥從事辦學和救國的工作，盡心竭力，效忠祖國，並為我自己落地生根，在海外建立事業，打下基礎。

在海外廣東人稱外省人為外江佬，華僑稱西班牙為大呂宋（菲律賓賓為小呂宋）。墨西哥原是西班牙的屬地，以西班牙語為國語。因此，他們稱墨西哥老婆為呂宋婆，所生子女為呂宋仔，在墨西哥住下來的華人是呂宋客（猶如舊金山的華僑被稱為金山客）。我祖籍四川，僑居墨西哥，既是外江佬，又是呂宋客。

在我未奉派出任墨京中華學校校長以前，我和墨西哥「風馬牛不相及」，但想不到在抗戰期間，我同華僑成為親密戰友，視同家人，得到他們的愛護，協助和支持。在全是廣東人的僑社裡，我不但未被歧視，還票選我為中華會館主席，出席全球僑務會議代

表和出席國民黨第六、七、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。我在墨國一住三十四年，墨西哥成為我的第二故鄉，直到我移民美國為止。

古人說：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愛人者人恆愛之，敬人者人恆敬之。我能得到墨國華僑的敬愛，緣於我在抗戰期間，為僑眾，為國家作出了貢獻和犧牲。至今點點滴滴，記憶猶新，且聽我從頭道來。

衝出夔門走向世界

人固然是受制於環境，但亦能突破環境，改造環境，因為路是人走出來的。由我一生的經歷看來，足証此言之不虛。

我於一九一二年出生在四川省岷江與長江匯合的宜賓縣（今為宜賓市）的一個小商人家庭，父親思想較為保守。四歲發蒙，便送我入私塾，攻讀四書五經。在一個偶然的機會，我讀到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和新青年雜誌，我的思想大為解放，不甘做井底之蛙，而有衝出夔門走向世界的夢想。我認為只讀古書，無法吸收新的知識，遂不待父親同

意，以同等學力考入敘州聯合縣立中學初中。三年後畢業。當時宜賓尚無高中。我步行七日，到了成都，考入成都聯中（今為石室中學）的高中部。我以成績第一，免交學費，並在課餘擔任家教。高中畢業之後，我去重慶工作半年。禁不住升學的慾望，我又由重慶赴南京，投考公費學校。適僑務委員會開辦僑民教師訓練班，全部公費，每月還有津貼，亦符合我想出洋的志願，我遂報名投考，幸被錄取。

在僑師班讀書時，我獲得很多海外知識。對於各地華僑情形，亦多所了解。一年結業之後，我被派往香港某中學任教職。我嫌香港太近，加以婉辭，改就僑委會某大員所辦之日報，擔任編輯。至一九三六年夏，僑委會徵求我出任墨西哥京城中華學校校長，但提醒我墨京華僑不多，待遇甚薄，月薪僅墨幣八十元（當時墨幣三元六角換美金一元）同時又說，墨國華僑文教事業，亟待開發，希我加以考慮。我血氣方剛，慨然承受這挑戰性的工作。因交涉簽證費時，我遲至一

九三七年三月初，才由上海搭胡佛總統輪啟程，經神戶、橫濱、檀島而至舊金山上岸。轉搭火車經洛杉磯至德州之巴索（PASO）進墨國邊境，改乘墨國火車而去墨京，為時將及一月。

舉目無親言語隔閡

當我一個人坐在去墨京的火車廂中，看見窗外一片荒漠，人煙稀少，除了遍地叢生的仙人掌和龍舌蘭之外，幾於無農作物，心中不禁冷了半截，想起李陵函蘇武書所說：「遠託異國，昔人所悲……終日無親，但見異類……舉目言笑，誰與為歡」，正是我此時心情的寫照，直到第二天的中午，才見到綠色的丘陵和田野，村鎮和教堂，才回復到文明的世界，愈近墨京，愈為繁華，不安靜的心情才舒緩下來。

墨京海拔二千二百公尺，雖處於熱帶，而氣候溫和，四時如春，草木常綠。市內高樓大廈，車水馬龍，與歐美都市無異，而教堂建築，仍保留傳統的風格。墨國土著，華僑稱之為茵陳。據說兩萬年以前，亞洲的蒙古族有一部份由西伯利亞渡過白令海峽，到了阿拉斯加，再南下而至墨西哥、中美洲以迄秘魯。都屬於同一種族之分支。我看到那些黃膚黑髮的茵陳人，不禁有親切之感。墨人暱呼華人為 PAISANO（即同胞之意）不為無因，至是我對墨西哥的觀念，為之一變。

我初到這陌生的環境，舉目無親，而言語隔閡，更是一大障礙。但我下決心，自力更生。第一、我要任勞任怨，創造一個有利於我的環境。第二、我要克服語言上的障礙，練習西班牙文和廣東話。第三、我以忠信待人，勤懇做事。以誠感人，以德服人。第四、我不爭名利，不計地位，以服務為天職，以助人為快樂。我堅持此四項原則，相信一定可以得到華僑們的好感。

如何解除語言上障礙，應是先決問題。我在僑師班讀書時，已能聽得懂廣州話，雖然講得不好，但墨京的華僑，以台山縣人佔多數，與廣州話有些許的差異，我須重新練習。至於西班牙話，我須從頭學起，但我有的是時間和精力。因為中華學校每日上課由下午三時至六時，便利華僑子弟在墨國學校下課之後，前來補習中文，教書已有教員擔任，我的工作甚為輕鬆，可有充分時間接觸華僑，練台山話，更可讀書看報，自修西班牙文，因此，我不到半年時間，勉強通過此一難關。

雙語教學唱遊並重

最初我認為學校校務，非常輕鬆，稍後才發覺事情並不那樣簡單，因為墨京華僑人數不多，純粹華人（即由廣東來的）約有一千五百（加上呂宋婆和呂宋仔，估計有三千以上），住地又不集中（中南美洲亦有同樣情形），不似美國和加拿大之有中國城（

CHINA Town）集中一處，華僑子弟大都能講粵語，辦學較易。墨京華僑，除極少富商外，一般都經營咖啡餐館和雜貨店，以及打工謀生，收入不豐，回國不易。在中國有家室的，每年寄回養家費用。久之，不耐孤寂，便與墨女同居，成「兩國兩妻制」。單身華僑，更不必說，何況墨國女子多情，特別喜歡華人。因為華人對家庭負責，不似墨人之隨便拋棄，所以更易得墨女之垂青。旅墨華僑，幾於百分之八十有呂宋婆，所生之呂宋仔，因為跟隨母親的時間多，自不會講「唐話」（華僑習稱中國為「唐山」，中國話為「唐話」）。因此，中華學校非用雙語（粵語和西班牙語）不可，此係環境使然。

我舉兩個例子：我國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和文學家林語堂，均曾先後來過墨京遊歷，我都請過他們來校對學生講話。陶、林二先生講國語，我傳譯為粵語，另一教員再轉譯為西班牙語，學生才能了解，可以想見語言是大問題。

我接長學校後，發覺學校所用之教科書，係國內的課本，學生倍感吃力。我為此另編補充教材，適合墨國環境與生活的需要，粵語與西班牙語對照，大受學生歡迎。我又增設唱遊一課，教學生愛國歌曲。並以遊戲方式，載歌載舞，寓教學於娛樂。這般「呂宋仔」具有歌舞天才，正合他們興趣，比教科書收效何止十倍。此外，我還有個構想，擬將中國歷史上的英雄故事摘要譯為西班牙

文，使呂宋仔了解中國的歷史和文化。我認為這事非常重要。因為語文只是工具，即使會講「唐話」，而不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，與「番鬼仔」無異。反之，深入了解中國歷史文化，即使他不會講「唐話」，在意識方面可以說他是「唐人」。我的這種理想，限於人力財力，始終未能實現。

團結僑胞支持抗戰

我到墨京以後，因校務甚為簡單，我有空餘的時間，除了學習語言之外，很想替僑胞做點事。但要搞僑務，首須瞭解僑情。因此，我不斷拜訪僑團，訪問僑胞。三個月下來，我對僑情已有相當了解。墨京有個中華商會，是全僑的團體，但具有勢力的則為國民黨與致公黨，其他則為地方團體，如海晏公所、三邑會館、新會同鄉會等。另有宗親會，如黃江夏堂、陳穎川堂、李氏公所等，總計僑團有十九個之多。中國人素有門戶之見，團體愈多，意見亦多，尤其是國民黨與致公黨（有些地方稱為致公黨）因為含有政治性質，形成對立。

致公堂是洪門之一支，以反清復明為宗旨，已有三百年之歷史，是美洲華僑最早而最有實力之僑團。孫中山先生早年奔走美洲，為革命而籌款，致公堂曾予以援助。可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後，致公堂與國民黨嫌隙日深，在墨西哥更為激烈。二十年代，由筆戰而槍戰，互有傷亡，幾成死敵。我到墨京

之後，曾往該堂拜訪，見其大廳之內，尚插有五色國旗，可見該堂並不承認國民政府。我認為如何解開致公堂與國民黨間的死結，是搞好墨國僑務的關鍵，我願為此任務而努力。

我到墨京才三個月零幾天，蘆溝橋事件爆發，全面抗戰開始，這是我報國的良機，亦是團結僑胞的絕好機會。我首先去訪問幾位有力的僑領，包括國民黨和致公黨的實力派，他們都有志一同，願意出面，在取得共識之後，我才向中華商會建議，以該會名義，於七月三十日召集墨京十九個僑團派出代表，在中華學校開會。各代表如期到齊，由我報告抗日形勢及成立全僑救國團體之必要，全體代表一致贊成，決議成立「墨京華僑抗日救國後援會」。

至八月五日，救國會正式成立，我被推選為常務委員之一，而實際的工作，則由我來策劃推動。

救國會成立後的首要工作是勸募救國公債，以為政府後援。在愛國熱誠激動之下，成績甚佳，共計募得墨幣四萬餘元，平均每一華僑捐出三十元，出一般人預料之外。（當時華僑工資每月不過七、八十元）我認為這是華僑首次大團結有以致之。

由於墨京是墨國的首都，登高一呼，各地響應。下加省、芝省、渭省、周省、尾利打等地亦不甘落後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救國熱潮，普遍全墨。

排除萬難創辦僑報

我認為救國之道，除了捐款，宣傳亦屬重要。墨國尚無華文報紙。他們所看的華文報，由美國的舊金山或紐約寄來，需時一個星期。抗戰期間，大家對於戰事進展情形，非常關切，西報雖有記載，但一般僑胞西文水平較差，不甚了解。鑒於這種情形，我覺得有出來擔當此一義務之必要。說起辦報，在墨國人才與錢財均告缺乏之下，談何容易。但我下定決心，排除萬難。首先徵求幾個知識青年，做我幫手。他們激於愛國熱誠，願盡義務效勞。於是我向救國會建議，創辦一份小型日報，名為「抗日新聞」，由我主持。工作人員，除了一名全職人員受薪之外，其他全係義務職（包括我在內）開辦經費由僑胞捐助，以後經常費，由廣告及報費收入來維持。我以社長而兼編譯，將每日各西報刊登有關抗日戰事消息，譯為中文刊出，同時向舊金山及紐約華文報交付航空郵費，可以隔日收到報紙，可快過平寄五天。使得新聞內容，較為充實。此外，墨國新聞與華僑有關者，我亦摘要譯出。全墨各地有關救國捐款新聞，我亦刊出，以資相互激勵。此報一出，係墨國僑界破天荒之舉，幾於每店每戶都訂一份。該報不靠津貼，一直維持到抗戰勝利為止。雖然我為此報每天要付出一個上午時間，但看到僑胞歡欣滿意，我精神上感到莫大的安慰。

一九三八年三月，墨京國民黨直屬支部召開代表大會，我提議創辦「僑聲月刊」亦得大會通過，由我主編，此刊另有其他同志協助，我只是看看稿而已。該月刊我一直負責到一九四六年，才由他人接辦。墨國除了致公堂出版有「公報」外，便只有我主辦的一個日報和月刊，可說是華僑精神上的食糧。

話劇募款獻金救國

墨京華僑平日消遣，不外打牌賭博，原有一個演粵劇之「華僑樂班」，因後繼無人，演員大都老去。勉強每月演出一次，華僑不感興趣，觀者寥寥可數，我有鑒及此，又動一個念頭。先向救國會同人試探，看過話劇沒有，他們都說沒有看過，只聽說過，我問他們不想看？他們反問我，你會演話劇嗎？我說，不會。但我想辦法去找人湊一湊。因為在我認識的華僑青年中，有多位對話劇有興趣。在我同他們進一步商談之後，他們興趣更加濃厚，希望我出來領導演出，適是時廣東省政府擬籌款買飛機，特派顧問錢樹芬來美洲向華僑捐款，到了墨京。我便乘機向救國會提出演話劇來籌款，大家當然贊成。我遂花了一個星期，撰寫「守財奴傾家蕩產」劇本，於一九三八年八月假民衆大戲院演出。因係墨京華僑首次看到話劇，大為轟動。各演員亦努力，情形逼真，獲得僑胞贊賞。後又應大衆之要求，再演一場。計

售票和義捐共計收入七千餘元，全數匯回廣州，獻金救國。

有一位老華僑黃寬焯先生對我說，我八十多歲未曾哭過，今晚看了你的話劇，不禁老淚縱橫，實在太感動人了。那些青年演員看到僑胞反應如是熱烈，希望我繼續下去。我亦認爲抗戰係持久戰，勝利未知何日。如果照例派人沿門募捐，久則生厭，必致每況愈下，不如寓救國於娛樂，收效更大。我更認爲不只要演話劇，還要擴充爲游藝會，多形多姿，才能取得更佳效果。因此，我號召男女青年和對娛樂有興趣的僑胞，於一九四〇年二月成立「救國游藝社」，我被推選爲社長兼話劇股主任，另設粵劇、音樂、歌舞等股，分推專人負責。並決定每兩月舉行游藝會一次。租賃戲院和推銷戲票由救國會負責。所有戲票及義捐收入，由救國會經收匯，爲救濟傷兵難民之用，至抗戰結束爲止，救國游藝社先後演出三十三場，共捐得款項約計十五萬元。（救國會籌款共計五十萬元）

犧牲奉獻無怨無悔

在此六年期間我先後爲游藝社寫了「中華兒女」、「再生」、「贖罪」、「飛將軍之死」、「倭奴未滅不爲家」、「異國情鴛」、「詐降」、「賣花女」、「游擊隊之母」等十多個劇本，亦演出國內作家的劇本，如吳祖光的「鳳凰城」，丁玲的「重逢」等

。這裡我要加以說明，爲何要自己寫劇本？因爲墨國華僑的知識水平較低，了解力較差，我寫的劇本，以華僑所熟習的背景和人物爲題材，較能迎合他們的理解力和興趣，更受歡迎。此外，我又將中華學校學生所熟習的愛國歌曲，串聯，編成簡單歌劇演出，亦爲僑胞喜愛。外來的藝術表演者，如余賀增魔術團，我亦邀請他們義務演出，而我們的音樂股亦在西人團體演奏中國音樂助興。

抗戰八年，我始終站在海外救國工作的前線，只有兩次因公短期離墨。第一次是一九三九年五月奉中央電召回國，在重慶中央訓練團受訓一月，第二次是一九四五年五月回國出席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。當我抵達印度加爾各答，看到各大建築物上飄揚中、美、英三國的國旗，顯示中國已爲世界四強之一。又看到中美軍官昂首闊步，並肩而行。並有孫立人將軍向我們報告緬甸作戰經過，那時離日本無條件投降還有四個月，但我已預見勝利即將到來，我的工作，沒有白做，我的辛苦，沒有白費，因爲勝利屬於我們。今天回想起五十多年前，我白日夜晚都爲救國工作忙碌，上午編報，下午辦事，晚上寫劇本，排演話劇，到了午夜才得休息，八年來如一日，我的熱情感動了僑胞，僑胞的熱情更感動了我。我們都無怨無悔，默默做出貢獻，既不受祿，亦不邀功，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。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二日於美國加州